

从不同视角分析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关系的发展变化

伍庆玲*

阿拉伯世界^①是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价值、阿拉伯语为交流工具的文明体系，与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并称为世界三大文明体系，其中，伊斯兰与儒家文明分别位于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自公元 751 年的怛罗斯战争（Battle of Talas）后，双方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换言之，古代的伊斯兰与儒家文明看起来各自封闭，且是互不干涉彼此的内部事物。^②但自 16 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刺激了文明之间的交流，整个世界随之改变。西方社会的技术进步不仅方便了西方文明的扩张，也使另外两个古老文明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往，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近现代以来，中国和阿拉伯各国推翻殖民统治，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彼此相互承认，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间关系。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分重视与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是 1956 年中国与埃及建交。改革开放后，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经济与政治合作齐头并进。随着中国从中东输入石油数量不断增长，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政府间的教育合作和文化交流项目、民间的商务与私人旅游也频繁起来，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密切交往前所未有。

对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中外学者已做过较深入的研究，本文即试

*本文作者系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副教授。

① 目前加入阿拉伯联盟的国家有 22 个，本文研究重点是中东阿拉伯 13 个国家，包括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埃及、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约旦与巴勒斯坦。但是，国内外统计数字所指的阿拉伯国家，大部分包括其他 9 个阿拉伯国家。

② 古代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不断地爆发冲突与战争。在人类文明社会早期，战争有利于打破文明之间的隔绝状态，所以古代伊斯兰文明体系与基督教文明体系相对比较密切。

图整理前人研究成果,分析研究中阿关系的理论视角,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中外学者关于中阿关系的相关研究

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家郭应德是较早研究中阿关系的学者,他在《中阿关系史》^①一书中,勾画了古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频繁交往的历史画卷,并对史书中记载的地名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彭树智先生在从事中东历史研究与教学时,十分重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史。在彭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东史》与《中东国家通史》等书中,都有专章描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更加重要的是,他的文明交往论为中阿关系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肖宪教授较是中国首位以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东国家关系的学者。他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和中东关系研究,1949-1979》中,探讨了中国与中东各国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对这一时期中国对中东的外交政策进行审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吴磊教授是近年来以研究中国石油安全而知名的学者,他从世界石油市场的供求与中美关系的角度考察中阿关系,认为保障获得长期和稳定的海湾石油供应,将是中国中东战略的核心问题。^②姚继德教授对中阿关系的看法也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中阿关系应该矫正目前单一的能源优先的外交政策,避免短视和功利性。他主张在“大周边战略”框架下,将中阿关系提升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地位。^③

近年来,研究中国与阿拉伯关系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文明”。2005年开始,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每年举办一次“中阿文明对话”,到2010年12月,已举办了6届。此外,人文因素也成为中国学者的关注点。^④

穆罕默德·胡葳丁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研究中阿关系的阿拉伯学者,来自阿联酋,是英国杜拉姆大学博士。2002年,劳特利·柯瑞(Routledge Curzon)公司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与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国家关系(1949-

① 江淳、郭应德著《中阿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吴磊著《中国石油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③ [阿联酋]穆罕默德·胡葳丁著;姚继德、冀开运译《中国与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国家关系》,线装书局,2008年版,第1页。

④ 参见马丽蓉《中国对中东的人文外交》,载《国际观察》2010年第1期。

1999)。他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发展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是为了满足自己对石油的需求，获得长期的能源供应，确保经济的发展。在评价前人研究成果时，他肯定地指出，西方学者对中国和中东国家关系进行研究，首推以色列的希霍（Shichor）教授。^①继希霍之后，国际学术界又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和中东国家关系的资深学者，如约翰·卡拉布里斯（John Calabrese）。他们在史料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异，大部分学者的著作出版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前，较少关注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石油关系。值得一提的还有库马拉斯瓦米（Kumaraswamy），他长期关注中东问题。在 1999 年主编的著作中，他提出这样的观点：中国在中东的活动并非想挑战大国的利益，不过是为了寻求在中东的影响力。究竟什么是中国寻求的影响力呢？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72 年被联合国接纳以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承担一些国际义务。这些学者致力于分析中国在不同时期在中东寻求政治影响力的方法与后果。由于他们用英语写作，采用西方学术思想与方法，因而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

21 世纪以来，中国和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新的命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出现，中阿关系的研究也需要选择更多的理论与方法。

相关理论与案例

相对其他地区关系来说，中阿关系历史进程相对单一，国内外学者运用的史料基本相同。研究中阿关系的学者大部分只是运用已有国际关系理论，并不力求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而发展变化中的国际关系理论，拓展了中阿关系研究的视野。

（一）相关理论

研究中阿关系的时候，通常会遇到两种类型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一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按照现实主义理论，国家利益是国家间关系的根本，任何国家对外关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国家利益。这个理论虽然是二战以后才出现，却风靡全球，有许多可取之处。现实主义理论不仅对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在中国学术界，乃至阿拉伯学术界，也已得到广泛传播，许多

^① [阿联酋] 穆罕默德·胡戴丁著；姚继德、冀开运译：前引书，第 131 页。

学者都愿意用它分析问题。其二是修正主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而是修正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群。它们有一些共同点,首先,承认现实主义是认识国际关系的有力框架,但是,它们不承认任何一种理论是万能的,以至于能够全面解释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它们批评现实主义的缺点,提出新的理论与方法。亨廷顿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冷战结束后,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强调文明对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作为一位国际关系处于转变时期的学者,他的文明冲突论似乎是新旧混合。一方面,他突出了国际政治中文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仍旧摆脱不了现实主义国家利益观。他认为文明是相互隔绝的,明显忽视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往。他把西方文明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误认为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将合作对抗西方文明。

西方学者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认为,国际关系必须抛弃一个僵化概念——权力政治,威胁和冲突迟早会让位于互利合作和一体化。^①但是,批评家认为,博尔丁的观点具有更多的哲学意义。

近年来,建构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影响有所加强,中东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在现实主义理论影响下,人们通常认为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建构主义认为决策是社会构建的,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颠覆了传统观念。建构主义的名言是,“决策是决策者所处的社会环境通过决策者的观念制定出来的。”^②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建构主义并没有完全摆脱现实主义的理论核心,而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力图重新展示国际关系的形成过程。

上述这些理论常被运用于中国与阿拉伯关系的研究中。

(二) 研究案例: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关系

沙特阿拉伯是很有影响力的阿拉伯海湾地区国家,著称“石油王国”和“伊斯兰盟主”。石油王国显示它的经济实力,伊斯兰盟主不仅是因为麦加和麦地那在它境内,而且暗示它享有的地位。虽然沙特是最后与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但是近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很快。

直到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沙特阿拉伯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究其

① [美国]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596页。

原因，某些现实利益的冲突的确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用建构主义理论分析就会发现，两国曾经错误解读了对方，将两国矛盾因素放大，例如沙特误解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中国共产党批评沙特君主制等。这些因素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曾经阻碍双方建交，但是两国建交后，这些因素不再发生明显有害的影响。

现实主义的因素固然存在，但在这些因素后面，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崭露头角，发人深思，值得思考，如肯尼斯·博尔丁所提到的互利合作和一体化。“求学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是圣训记载的穆罕默德先知说过的话。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与外界隔绝的文明更是加强了与域外其他文明的对话。沙特王室君主大力推行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他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很清晰，坚定地对外开放，并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儒家文明是东亚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太地区有自己的地位，在整个中东地区影响力比过去增强。同样，沙特也在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寻找着自己的合适位置，这就如同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尼古拉斯·奥努夫所言“我们利用自然提供的资源，通过彼此之间的行为和话语，使世界成为世界。”^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影响中国和沙特关系的重要因素是石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存在特定的国家利益，巩固和发展与沙特的石油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2005 年，沙特成为中国第一大能源供应国，两国贸易额达 160 多亿美元，同时沙特成为中国在西亚北非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获得保证的同时，两国人民间的交往也闪耀着火花。这两个古老民族发挥人类的美德，诸如宽容和平等，慈善与博爱进行交往，2006 年 4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沙特王国协商会议发表题为《促进中东和平 建立和谐世界》的演说，他肯定阿拉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及其对国际关系的贡献。2008 年，中国四川省汶川发生大地震，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向灾区捐赠了 5 000 万美元现金和 1 000 万美元的物资，是对中国援助资金额最多的国家。在 2009 年世博会期间，沙特展馆异常火爆，人潮涌

^① [美国]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前引书，第 158 页。

动，中国人十分渴望了解这个沙漠中的王国。当前中沙关系的发展趋势十分良好，既符合沙特的国家利益又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和沙特需要继续加强文化的沟通与理解，并超越石油资源的供求关系，超越政治利益的平衡关系。而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有利于中国和阿拉伯民族友好关系保持下来。

结 语

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比较，我们发现，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在两个层面上发展，其一，是为了谋求现实利益，即获取短期利益。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中，存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辩证关系。如何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二，谋求长期合作与发展，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和谐世界。这一层次发展的动力，是人们对不同文明渴望了解的永恒追求。文明交往论认为，利益是驱动文明交往的因素，经济利益是最根本的利益。但是，仅有经济利益是不够的。早在春秋时代，墨子就说过“兼相爱，交相利”，互利与互相敬爱应该并存。开放，不仅是中国要面向欧美国家，还包括面向阿拉伯世界。文明交往论，从哲学高度寻找到中阿关系发展的持久动力。文明的自觉性，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核心。也就是说“不论人们之间如何矛盾冲突，人类总是要在同一地球上生存发展，各种不同文明总要接触对话。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期待着通过不同文明思维交往，架起彼此理解之桥。”^①它推动了文明交往在精神领域的渗透，有利于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与和平共处，并将带来人类文明的升华。

笔者认为，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是不同的文明体系，需要相互认识，相互接受。中阿关系友好合作的局面得来不易，需珍惜、巩固与发展。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